

从2005年到2011年,王小妮在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任教,诗人王小妮“变身”为教授王小妮,这份工作和以往的很不一样。

在海南大学的这几年,王小妮把一些关于上课的片段,连同感受一起记录下来,每学期整理一次,尽量保持其原貌。2011年结集出版,取名《上课记》(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年12月出版)。书出版至今,仍不断引起文化、教育界的关注,引发系列对当今教育的思索。

近日,王小妮接受了海南日报记者的专访,谈她在海南大学工作的感受、她的学生,以及她眼中的教育。

关于上课:尝试着做一个好老师

在《上课记》这本书里,王小妮透露,当初到海南大学任教的直接起因,是大约一次和评论家崔卫平聊天,崔卫平认为王小妮能做老师。“心里的某种东西被无意间启动了”。因此,2004年,有了个做老师的机会,“虽然学校在偏远的海岛上,既不悠久也无名气”,但“这个教职或者成为潜在的提示和鼓舞:也许我能试着做一个好老师”——也许这就是缘分吧。

海南周刊:您当初是抱着尝试的心态开始当老师的吗?

王:没有很明确的心理预期。

海南周刊:海南大学“既不悠久也无名气”,您为什么选择了它?

王:不适应北方了。2004年时候的海南岛和2011年比较,已经完全不同了。

海南周刊:在海大上课的这些年,整体感受如何?在海南的生活感觉又是怎样?

王:整体要感谢一批批的年轻人,给我温暖的推动力。

海南该做的太多,做事太慢,它要真进步,必须培养自己的稳定而清晰的中产阶级,起码是有担当的白领阶层。它不能迷糊地总在午睡中。

海南周刊:一开始,您对上课这件事有没有感到不适应?

王:现在看,从上课中学生们给予我的更多。感谢和他们共同度过的日子,那些默默地从我一个人读一首诗,到大家渐渐跟进来诵读的片刻。

过去不懂上课是可以“开发”出不同、新意和创造性的,没有最好的课,它是可以无止境地讲得更好的。

海南周刊:您在书中写到,很多学生是调剂过来的,知识、见识也都不太多,一开始您对此失望吗?如果可以,您更愿意教什么样的学生?

王:始终都有心理准备:给我什么学生就教什么学生,给我什么课就讲什么课。失望会片刻地冒出来,再快速地淡下去。我没想过可以选择,因为没享受过选择的可能和机会,始终都是无条件地接受着。

如果能选择,可能选择给本科的多来自底层的低年级上课,再给爱好和可以深入地进入语言的神秘的内部的同学交流,互学互进。当然,活着本身就不是选择而是被选择。

海南周刊:您上课的形式和内容都和传统的课不一样,具有理想主义色彩。这些年下来,收效怎样?

王:传统就是个教书匠的生活,这个不是人人受得了,宁愿费力我也不容忍重复。

他们还小,还不到看得见收效的时候吧。起码学生们知道这个老师很认真,这个老师爱惜学生。

一个2005年教过的学生发来邮件说,看我寄给他的《上课记》,同时又找出《许三观卖血记》一起看,发现和大一时候的感觉完全不同,看到许三观大哭的时候,他也哭了。这是男生,他现在一边在电视台工作,一边还教影视课,他都当老师了。现在每次课的前十分钟,他读一段《上课记》,他说借用了老师的方式。这个学生大一的时候专门上课睡觉,铃一响他又准醒,怪的是,讲了什么他似乎全知道。

关于《上课记》

在《上课记》中,王小妮说,在7年来的上课,多花费了力气,有课的几个月几乎不再写别的东西,尽量推掉校外活动,腾时间看更多的作业,听任何一个愿意说心事的学生们的故事,“普通的大学老师一般不这么做,太耗神”——可是,再三投入其中的冲动又不可消灭,“只好顺应它”。

海南周刊:您现在还在继续给海大学生上课吗?以前的学生还保持联系吗?

王:2011年《上课记》正在写。我教过七届学

王小妮近照



王小妮： 与众不同 《上课记》

文/海南日报记者 王亦晴

生,都有联系的。有的已经在作电视,作独立影人,在教书,在各种公司里。

海南周刊:《上课记》写作过程很特别,在上课时感受随手记下,过后再整理出来,像工作记录一样。写的时候您的心情是怎样的?

王:随手记,尽量当场记,有时候记在手机里,上课期间只是记录,课停了之后再看记录整理,有些用上了,有些不能用,不能用的多数涉及同学个人的部分,尽量避免他们被伤害。每年都有在刊物发表过,现在这个是个结集本。

写作的心情是复杂和沉重的,这和写诗很不同。

海南周刊:您是诗人,在大学上课和写《上课记》,有没有影响您的诗歌创作?如果有,您会觉得遗憾吗?

王:当然影响,上课的时间会读书,但静不下心来写什么,心是不断起伏的。没什么遗憾,谁也不是为一个目的活着的。采取什么上课方式都是自己的选择。

海南周刊:《上课记》结集出版时,您有意保持当时记录的“原貌”,在写作课上,您也让学生们不要展示所谓文采,避免使用所谓“好词好句”,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。您是想倡导一种返璞归真的生活态度么?

王:《生活本如此》一书里写到了,谁说我们一动用了文字就去给生活涂脂抹粉和虚假造作?不秉承和抛离生活的本真,是汉语几十年来都面临的问题,这样形成了两种语言,真语言和假语言,随之而来的当然有真面目和假面目等等。我只是试试从语言开始还原真实。

关于教育:致力培养“平凡的好人”

《上课记》一书中,王小妮写到,海南大学“是一所地道的底层的大学”,它的生源大半来自底层,他们将来是构成这个社会的基础,未来社会的根基。他们个性中的淳朴务实很多是天然的,如果他们能清晰设定做人的基本的底线,我们或许不该放弃对未来的希望——她认为,一个正常的社会不是缺精英,恰恰缺少平凡的好人。

海南周刊:您2005~2011这几年在大学当老师,和预想的有差距吗?

王:差距很大,超过了预期,本是想安静地躲在小岛上写诗看风光的,最后变成了一个准老师,从学生身上得到了从不敢预期的有重量的回报。

海南周刊:看《上课记》,感觉您总是和周围环境保持距离,以审视的目光看待这一切,包括学生、大学、教育体制。是性格使然,还是您有意为之?

王:性格,做截然独立的边缘人是本性。我知道别人在干什么,那不等于说人人都本该如此,大多数的所为就是正确的好的必然的。我的课上不断地告诉他们,总是有人在别人都这样的时候偏偏遵从自己的内心走另外一条路。不然这世上就没有诗了。

海南周刊:您觉得,您这种有些理想化的教学模式应该在大学里推广,取代照本宣科的传统模式吗?

王:很难,要看每一个教师自己的选择,况且,任何个人都只是个人,是不可重复的。《上课记》只是一个人的视角和努力的记录而已。

海南周刊:当下,许多大学以“杰出校友”为荣,以“今天你以某校为荣,明天某校以你为荣”勉励在校学生奋斗,您怎么看待这其中传递的价值观?


王:每个人都应该以自己为荣,并无其他。

海南周刊:您希望多一些学生成为“杰出校友”吗?您认为怎样算成功?

王:我的期望很低也许是很高,希望我的学生都找到工作,能养家糊口和善待长辈,在这社会上站住脚,别被各种风给刮丢了,同时别忘了心里有底线有个做人的标准,像待自己一样地待周围的每一个人。保持守护住自己都是最大的成功。

海南周刊:您心目中的好老师是什么样的?

王:真爱学生,真有学问。

王小妮,1955年生于长春市,曾随父母到农村插队和作为知青插队前后7年。1978年春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,后作电影厂编辑。1985年迁居深圳。2005年起在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任教。曾出版过多部诗集、随笔集和小说。近年作品有:《我的纸里包着我的火》(诗集)、《世界何以辽阔》(诗文集)、《安放》(随笔)、《一直向北》(随笔)、《倾听与诉说》(随笔)、《上课记》等。 

惟有生命真实可贵(2010年上课记)

现在的学生看来轻松懈怠,但我的邮箱里常收到他们发来的诗歌散文剧本、书评、影评、感想、意见、求职信、策划书。春运期间学生们在火车站整夜排队却买不到车票的维权信,经多人以不同方式转给我。所有这些都和大学课堂无关,这些也是他们正自觉“学习着”的行动力。我个人不欣赏激昂愤慨,拍案而起,我那代人的特征不该平移切换给下一代,他们有理由更理性更淡定更包容,具有多向度的价值取向。但是,我也听到这样的故事:

学生:老师,告诉你一件好玩的事,上学期就为争当学生会的头儿,两伙人在校运动场看台上打起来了。

我问:谁打谁?

学生:一个男生被一女生叫来的一大帮男生追打,真打啊,都有人打电话报警了。

我问:为什么打,就为争着当头儿?

学生:真开眼了,恐怖吧。

我问:当头的吸引力那么大?

学生:当然,有权有钱啊。

就在类似故事发生的同时,更多的是下面的故事:

老师你不认识我了,我就是大一问题特多的小姑娘啊,老师我快毕业了,后来我得了忧郁症。

一个男生告诉我,那天有个同学发短信说:咱俩一起去死吧。男生回答:好啊,你快来吧,我先把你杀了。说这些的时候,他的表情超乎平静。我说:怎么就说到死了,这不是随口说着玩的。他说:就是吗,所以我没搭理他。

刚开学,有个即将毕业的女生跳楼轻生。虽然我不认识她,仍旧有4个和死者相识的学生跟我谈起这事。唐惠子搭在讲桌上说:老师,她到底为什么呀,漂漂亮亮的,平时可可爱说话了,当过主持人,一直很阳光一个人啊,说走就走了?

上课铃都响了,唐惠子还不离开,好像要追问出结果。当知识不能改变命运之后,这些在黯淡的角落里的年轻人靠自身散布的微小光泽存在,他们最后可依赖的只有生命的本能,以求得自己的精神支撑。如果有人要说90后注定了就是一代可怜虫,他们又是被如何造就的。四下里看看,哪个人不是可怜虫。我们的90后不来自火星,不来自恐龙蛋,每个都是这土地上平常父母所生。在生命面前,谁有道德优势?

(摘自《上课记》)



《上课记》封面